

赵安博^①

地点：北京万寿路甲 15 号家中

时间：1994 年 10 月 15 日下午



赵安博

钟：赵老，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您是怎么去日本的？为什么去日本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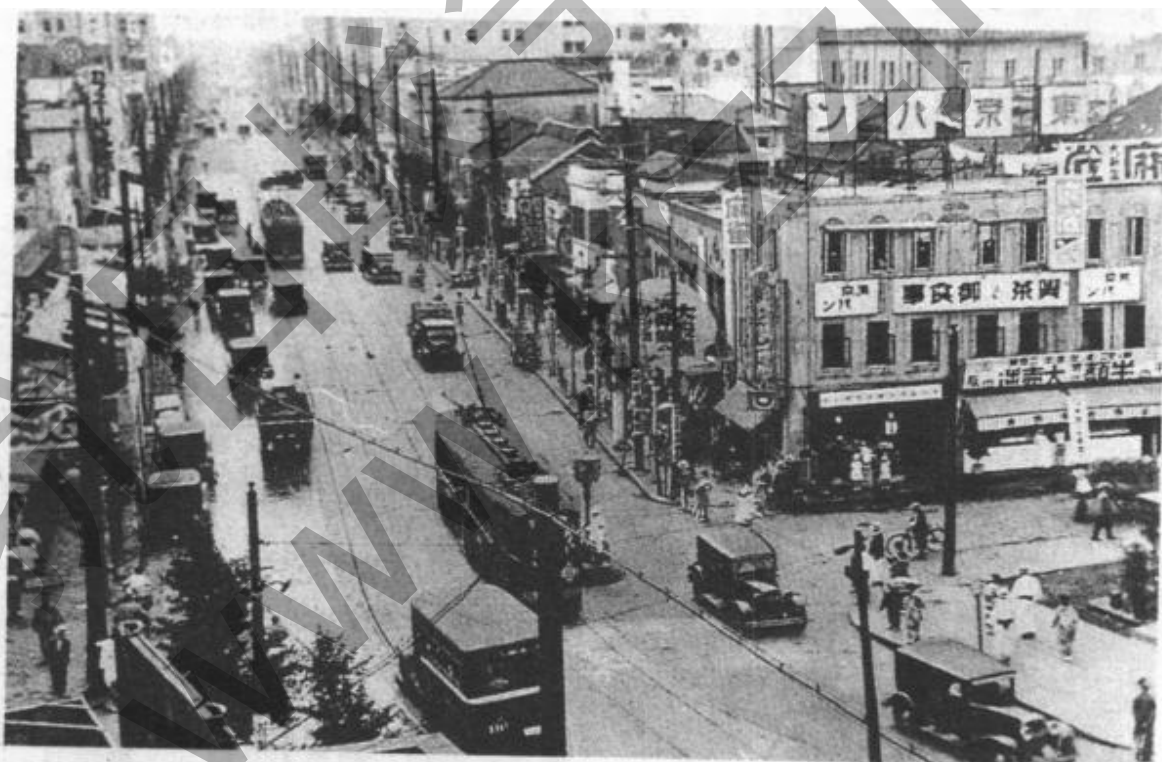
赵：我在上海青年中学念初中，后来到同济大学念高中部。那时已经发生九一八事变，学生到南京请愿，蒋介石先生还出来见我们学生，蒋介石说：“如果日本再进攻，我再不抵抗，你们就可以砍我的脑袋。”我在当时就感到他是在胡说八道，因为学生无权无力，凭什么去砍他的脑袋呢？完全是骗人的瞎话。那时我已经对国民党不满意了。同济学生中有进步的，有一位李青（音），他后来是青年团负责

①赵安博：1934 年 9 月赴日留学前，在上海同济大学附中读书，1935 年 3 月考入东京一高，1937 年 7 月“七七事变”后回国，参加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抗日。1949 年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。

人；还有饶斌，他后来是第一汽车工厂厂长。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到共产党身上。不过当时共产党会怎么样也不知道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也是失业，所以我同父亲商量以后，不在上海念书，就去日本念书了。那时日中生活费用差不多，中国一块钱还顶日本一块一毛钱。

我从上海乘日本船出发，叫上海丸。在船上面，日本酱油的味道很厉害，闻到了酱油味就要呕吐。但离开上海半个多小时以后，海水颜色就不一样了，在长江上的水是黄的，到了大海，海水是蓝的，我很高兴。在船上路上碰到一些同学。当时我已经学了4年英文和德文。

船一直到神户，上岸没困难，不要护照，也不要签证，只要买船票。那时我父亲做电器生意，同日本上海住友银行掌柜的认识。他介绍人来接我，在神户停一个小时，买火车票再走。



东京新宿

那是1934年9月。一上靠海岸的火车，就感到日本很狭窄。我们中国的火车在平原上，一望无际；在日本则一边是海，一边是山。

到了东京以后，我本来有一个同学，姓姚，来接我，错开了，没接到，我就自己到中华第二宿舍，等他来找我。

到日本以后，第一件事是学日语，因为不懂日文就不能上学、听课，生活也困难。我就上东亚预备学校。学校创始人是松本龟次郎，他是老资格，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。

钟：哦，您见过他？

赵：是，我见过他。他头发都白了，穿件小大衣。我有他的传记。他是秋瑾的老师，也是鲁迅的老师，有的还说他是周恩来的老师，不过没证据。

进东亚预备学校不要手续，只要报名，交一张相片就进去了。学校的老师教中国学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，用的课本全是自己编的。有松本龟次郎编的。他是静岗人，对于教中国学生很有经验。我学一个多月后，回到宿舍里，那位宿舍中的老太太就说我讲话有东京人口音。我学得快。

钟：学校教室同学有多少？

赵：教室中有几十名同学，松本先生自己也来给我们上课。松本先生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一个月以后死去的。松本对中国很有感情，他在乡下（静岗县）对周围的人说：“中国是绝对不会亡国的。”他周围的人都害怕，不让他讲话。他不怕，因为关东军好多司令官，还有好多人，都是他的学生，他不怕。可惜他死得太早了。

钟：那您在此学了半年？

赵：学了三个月。第二年，1935年3月，我就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，考中了。因为第一高等学校里边有一个教员，姓竹

田，他对中国学生有好感，我去见过他，他就把我录取了。录取以后，一高里面有特设高等科，专门招中国学生，有八九十人，有文科、理科。我编在理科乙班，因为是学德文的。我在同济学过德文，所以很轻松。我就把多余时间用来看马列主义的书。在日本，马列主义的书很多，价钱也便宜。到旧书店里去看书，看半天也没有人管。我开头就是住在神田，附近热闹得要命，晚上睡不着，我就睡进放衣被的小阁子里。

我就这样进一高了，一高实际就是东京帝国大学预备班。中国留学生要进帝国大学，像郁达夫进第七高等学校，郭沫若也进第六高等学校。一高就在东大旁边，就在赤门，离旧书店很近。书店老板坐在火炉旁，一边烤火，一边抽烟，看你进去也不理，买不买全可。我就买一点浅显的书，慢慢看懂了，像列宁讲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呀、经济学呀、唯物史观呀、唯物辩证法，多是河上肇^①的东西。

我在上海时也搞过日本人工作。我参加八路军是在359旅，王震同志跟我很要好，打仗叫我参加，我们抓到第一个俘虏叫吉积清。后来有日本人造谣，说八路军抓到俘虏要杀掉。为了粉碎敌人造谣，所以以后原地放回去。我们在晋察冀边区……

钟：赵老，您现在一下子跳到40年代了，我们还是回到1935年，您在一高的情况。

赵：唔。一高的学生很奇怪的，学了美国风气，喜欢穿戴破旧旧帽。晚上自修完了，就去学校附近小铺去，喝日本酒、啤酒。喝完酒以后，成群结队，一边唱歌，一边跳舞，把已睡着的同学都闹

^① 河上肇（1879--1946），日本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。曾任京都大学教授，获博士学位。被称为红色教授，193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，1933年至1937年被捕入狱。其代表作有：《经济学大纲》、《资本论入门》、《贫乏谈》（1917年）、《社会问题研究》106册（1919—1930年）等。

醒，然后再乱七八糟地乱睡一通。但是，要是看到中国同学，就兴趣来了，常常讲：“你将来回国去以后，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，领导中国老百姓；我呢，就会成为日本伟大的人物，领导日本老百姓。将来中日要一起合作，将来东方要兴旺起来……”

钟：这是喝醉了讲的？还是没喝醉讲的？

赵：半醒半醉。所以我在那儿睡不好觉。我在上海时身体好，打篮球的健将，所以呢，受点影响不厉害。我在日本还打篮球，日本人的篮球不行，日本人打棒球行。他们的一高同三高的对垒的比赛，我没有参加。我只在一高打篮球。

钟：还有什么社会活动您参加过？

赵：还有。日本有行军，过军事生活。半夜里吹喇叭，紧急集合。很快地穿上黑制服，很快地行军，要坐火车去很远，然后再走上山顶。夜里二三点钟，月亮照在河边，景色迷人，再美丽也没有了。现在还有印象。行军还要带背包、带枪，老师要求枪擦得干干净净，我是马马虎虎。老师看我是中国学生，也就不管了。要是认真搞起来，搞几个钟头也搞不干净的。子弹是假的，但有声响。

在日本时，还碰上二二六事变^①。2月26日，日本军队少壮派搞暴动，日本皇军很快就镇压下去了，那些负责人枪毙了几个。我们做学生的不了解情况，也不允许记录，也没有能力记录，只在学校里听的。那一天下大雪。

钟：演习明显是军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？

赵：是军国主义教育。我那时也参加演习，不过我在心里

^① 二二六事变，1936年2月26日，日本皇道派青年陆军将校受到北一辉影响，企图用武力完成国内改造，鼓动1400名军人发动政变，占领国会等地，杀死政府官员多名。由于各界反对，被定为叛乱而镇压，主谋者被处死，成立新内阁，对日本军国主义化影响颇大。

想：究竟我将来拿了枪，是打中国人？还是打日本人？就不一定！

我在日本时，法西斯教育就有了。所以我在一高时，就参加同学会，有救亡演讲会，中国留学生组织的，我记得我讲过一次“高尔基的生平”。我是看日本书介绍，那时学生中很流行高尔基，鲁迅在上海也介绍高尔基，我在东瀛也介绍高尔基的生平。

钟：这个活动，学校是不干涉的？

赵：学校是不干涉的。日本人不管。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也同情共产党，不干涉。

钟：您记得同学中还有谁？

赵：同学有姚继崇（音），可能在台湾；有骆肇基（音），现在还是上海水产大学校长；还有杨开基（音），陆军医院院长，已经去世了；还有熊健。

钟：您在一高念到哪一年？

赵：念到1937年，七七事变一爆发，我就要回国参加抗战，7月25日回到上海，郭沫若同船，是很讲究的美国船。

钟：那么，如果没有战争，您就会在东京大学读下去了？

赵：也不一定。那个时候已经对日本很不满意了。因为我一高时参加“中华同学会”，是几十个中国留学生成立的，关内外学生都参加。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建立“满洲国”，所谓满洲驻东京大使馆要分化中华同学会，让东北学生去参加满洲国同学会。但是关内关外同学团结得很紧，他们成立不起来。同学会的活动都是秘密地开会，因为中国关内关外学生占多数，像竹田那样的人也知道我参加中华同学会，他想分化，但不敢，怕闹事。

钟：你们的活动仅在校内？

赵：对，我们同日本学生没有来往，互相不了解，日本人看见也装作看不见。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有一定的革命传统，有许多进步的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

钟：您在日本吃饭有什么回忆？

赵：我在马桥住房吃饭，吃饭时掌柜的问我吃什么？我说吃很好的。他计算钱很贵，我也不知道，有钱就给他了。其他同学吃中华料理，买一个蹄膀才两毛钱，因为日本人不吃。

钟：上不上街？

赵：那时上街很少，因为没有钱。

钟：您对日本社会有什么印象？

赵：日本社会很乱，乱七八糟。日本兵还是比较有礼貌，我在街上走，爬一个坡，走得很慢，日本兵就慢慢跟在我后面，不催我。日本兵对日本人是很有礼貌的，在中国对中国人很凶，这一点我在上海有体会：上海虹口公园门口就有日本兵把守，中国青年经过门口，要鞠躬。那是1934年，抗战以前。

钟：哦？抗战前日本人在中国就这么凶！

赵：就这么凶。日本帝国主义嘛。日本的侨民也凶，在抗战前，日本人在上海搞的事情多了，“九一八”、“一二八”，全是日本制造的。

钟：日本侨民那时在上海就敢这样公开挑衅？

赵：是呀，公开挑衅，你如敢把他杀了，他不就可以出兵了！所以他挑衅，在租界里，北四川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，虹口公园一带。

日本老师对中国人还好。有一位叫片山民彦的，翻译过罗曼·罗兰的小说。我问他关于左派小说家和小说史中的问题，他回答我说这个人非常好，但也过左了一点。这说明他是自由主义的。后来我听说，在日本侵略中国卢沟桥之后他就辞职了。他

是一高的老师，他们一高的老师，好多不管政治，政治是军部的事情，教书就是教书。政治只有校训，一个星期训一次话。中国蒋介石也搞校训，我们不理，反正乱七八糟的，我们不听他那一套。

东北的同学里有好多进步的，倾向我们。有位吉林大学的王长信，写日本文学史的，就是当时很进步的，已经去世了。

钟：您在校内还有什么活动？

赵：我们在一高里，专门搞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，专门订上海出版的抗日的进步书刊杂志，有邹韬奋的、夏衍的，有《光明》杂志等，从中国寄过来的。中国留学生编的杂志也有。

钟：您作为当年去过的学生，您学到马克思主义，回国用上了？

赵：我在1937年参加八路军120师359旅，与王震同志一起，他每次打仗都叫我，抓到日本俘虏就要我问。头一个俘虏，送到延安总政治部，叫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当日文教员。后来一次抓到五六个日本兵，就放他们回去，以免敌人造谣。我主要做敌军工作。后来359旅回到延安，胡宗南进攻，359旅回去保卫。那时日本人野坂参三同周恩来一起到延安，毛主席对野坂参三到延安很重视，本来延安窑洞地上是土，就用木板铺上，给他住。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，野坂当校长，我当副校长，就跟日本人一起学习。教政治经济学的是王学文，教社会发展史的是何思敬，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是李初黎，他在几个月前去世。他是创造社的人。

钟：通过这几十年同日本民族打交道，从学习到战斗。今天中日两个民族要发展，您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希望？

赵：日本侵略中国，经8年抗战，日本打了败仗。但今天的日本某些人，对打败仗还没有足够吸收经验教训，还认为当

时的战争是圣战，是正义的战争，只是讲错话，结果遭到中国人民、世界人民反对。我听广播，在德国，谁要是赞美德国法西斯的话，要判徒刑三个月。日本也应订一个法律，谁要是肯定当时的侵略战争，就应该判他一年两年。日本对于处理战犯不坚决，使中国人愤怒，像×××，这一点不仅是我们搞日本工作的人的意见，也是全中国人的意见，也是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意见。

钟：您对现在中日经济方面的发展有什么意见？

赵：我搞不清楚。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，威信提高，要成为霸主。日本有见解的人也感觉到，但我说不好。